

深圳文博论丛

深圳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二〇〇六年合刊

深圳文博

深圳博物馆 编

论从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王 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文博论丛/深圳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010-2160-4

I. 深... II. 深... III. 深圳市-地方史-文集 IV.
K296.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6838号

深圳文博论丛(2005-2006年合刊)

深圳博物馆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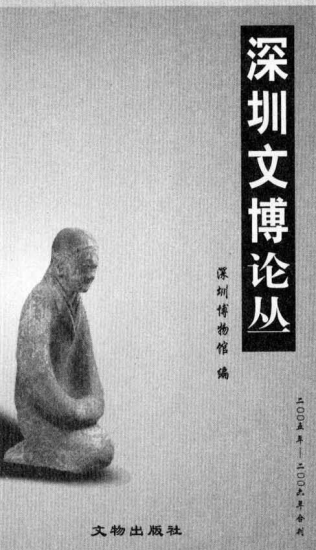
深圳市金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17.625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0-2160-4/K296.53 定价:80.00元



《深圳文博论丛》 2005、2006年合刊

主 编：杨耀林

副 主 编：李龙章

编 委：杨耀林、叶杨、李龙章、
张琬、莫小培、蔡惠尧、
容达贤

编 辑 部：李龙章、蔡惠尧、容达贤
谢鹏

封 面：西汉彩绘陶跽坐俑
(西安汉文帝霸陵出土
深圳博物馆藏)

封 底：东汉人面纹砖
(1987年深圳宝安
铁仔山汉墓出土)

学术论坛

试论考古学大众化的一面	李海荣	1
岭南地区出土的几种青铜乐器述评	李龙章	11
谈谈岭南青铜文化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李龙章	22
关于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时代与墓主问题的探讨	容达贤	32
泾州王母宫石窟窟主及开凿时代考	暨远志	44
泾州地区南北石窟寺与云冈二期石窟的比较分析	暨远志	58
民族和民俗文化调查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	黄崇岳	68
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和意义	张一兵	74

文化立市

播种深圳文化——云蔚成同志访谈纪实	莫小培	81
第三只眼看文博会	刘 琨	87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建馆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孙 霄	94

深圳历史

深港地区“迁海复界”以来的乡约	杨耀林	100
清初海防与赤湾炮台	刘均雄	107
深圳历史上的蚝业生产	容达贤	118
深圳在华南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刘均雄	124
深圳地方志考略	张一兵	133
大铲岛考古调查报告	史红蔚	144

特区史录

丛飞——深圳义工的一面旗帜	赵艺竹	146
试论深圳改革开放史陈列体例及相关问题	莫小培	157
南国起惊雷——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宣传追记	靳 萍	164
闪光的足迹——深圳特区史珍贵实物资料述要	靳 萍	171

目 录

深圳建筑的里程碑——国贸大厦	姜 蕾	180
福永凤凰村的祖先崇拜与家系继承	吴翠明	186
深圳市博物馆征集的宝安县实物选介	张小兰	195

文物鉴赏

唐宋铜镜的社会文化内涵初探	李培洁	201
时尚、怀旧的“月份牌年画”	李培洁	211
山水跌宕为寄意 兰竹劲挺志抒怀 ——南京博物院藏明清名家绘画展巡礼	黄诗金	214

展览精华

大卫来了 ——《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文节复兴艺术作品》展览	王海彬	224
把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到基层 ——《深圳抗日战争图片展》巡展纪实	骆晓莉	228

文博工作

深博《近现代深圳》陈列内容设计的若干特点	李 强	231
试论《记忆深圳——〈深圳改革开放史〉实物资料展览》 的陈列主题和陈列手段	李 强	234
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史实物资料展览”陈列设计 的几点思考	黄曼琳	238
博物馆应如何培养高素质的“资深”讲解员	陈海先	244
以人为本服务观众是博物馆的根本	侯玲雅	251
古竹木漆器的修复与保护	潘慧琳	256
古丝绸文物修复与保护	潘慧琳	263

海外拾珠

瑞典瓦萨古船博物馆观感	林易蓉	268
美国文博事业“走马观花”	黄崇岳 潘慧琳	271

试论考古学大众化的一面

李海荣

应该说自考古学确立以来，一直都有人对考古学以及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们或者认为研究考古学的人都是些“高级盗墓者”，其工作只是为了“挖宝”和收集过去的“古董”而已；或者认为考古学只是研究很久远的过去了的历史，与现代和将来没有多少联系；或者认为考古学神秘莫测，仅仅为专业的考古学者研究，与一般大众没有什么关系。以上的这些看法，有的只是看到了考古学的局部功用，有的是因为对考古学的了解还很不到位、很表面化，当然都是片面和不准确的。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意地不断对以往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以史为鉴，从过去了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成分，寻找智慧之光，以有助于走好当今和未来的路。其实，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有服务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功用，它具有大众化的一面。

考古学大众化的一面，是指考古学不是一门仅仅局限于考古学者封闭于“象牙塔”内寻古探远的学科，而是有其为当代以及未来的人和人类社会服务的一面，它是面向大众的一门学问。

一、为什么考古学有大众化的一面

1、考古学有大众化的一面是学科性质的必然

首先，无论是人文科学（文学、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还是

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直接或者间接地服务于人和人类社会，而人文科学与人的关系就更为直接和密切，因为它直接研究和直接反映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的各种活动。无论把考古学看作是人类学还是广义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或者认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本身而不是其它学科的分支，它都属于人文科学，这应该没有疑义的。人文就是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人文的范围继而还可以扩展到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以人为根本”的“人”，当然主要是指现今以及将来的人及其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考古学是人文科学的一员，这本身就要求考古学在研究其反映的已经过去的历史，即人类过去的物质、社会和精神活动的同时，也要为当代以及未来的人和人类社会服务，要以服务于人和人类社会在当代的生存以及在未来的发展为其终极价值尺度。其实，如果一门学科不能自觉、有效地服务于当代以及未来的人和人类社会，它就没有多少发展的前途可言，而且势必要走向边缘化甚至可能会消亡。

其次，虽然考古学直接面对的是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遗存（遗物、遗迹和遗痕），但是考古发掘并不仅仅只是掘出古代的遗存，而正象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惠勒所强调的，考古发掘也要掘出古代的“人民”；考古学的研究并非只是“见物不见人”，最终是要发现和研究“物”背后的人和人类活动，也就是要通过“物”

的世界的研究最终要反映古代“人”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我们均由过去塑造而成，人类的过去就是人类现在及其将来的“根”和“源”，谁也无法与历史断然绝缘。因而，对人类过去的发现和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今人类自我发现的过程，所以考古学无疑会为人的自我发现做出特殊的贡献。那么，也就是说考古学的研究不仅要古代的遗迹、遗物等进行分类、排比，鉴定其年代，判定它们的用途和制造方法，更重要的还要阐明存在于实物背后的人类各种行为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差异及其历史原因和规律，其最终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规划现今社会的某些方面以及建设未来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正确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另外，人文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使人能够像“真正的人”一样地生活和生存；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批判的精神，考古学的研究则贯穿着这种弥足珍贵的可贵精神。考古学是一门不断地自觉修正自己的实证性很强的科学，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的“考古学是一门经常打自己耳光的学科”，求真、务实是考古学的生命所在，大量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推翻或修正以前的观点和看法，所以说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人的自由的思想 and 自觉的批判精神。很多考古新发现虽然有偶然性，但偶然的发现又往往能够石破天惊，不断更新、改变或者修正我们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一块不起眼的人类骨骼化石、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刻画痕迹、几件粗糙的石器或陶器、一段不起眼的残垣断壁，顷刻之间都可能改写我们的历史。在现今社会中，实用功利主义对大众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常常可以听到“一切为利益让步”的声音，而上一个世纪鲁迅

先生在中国提出的“立人”的思想仍然是未竟的工作；另外，由于学科分支细化而诱发人文视野的萎缩和短视，所以缺乏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以及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社会良知和良心守护者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虽然人文素养、人文精神并不等同于人文知识，但是人文知识的积淀对于培养人文精神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言而喻，在考古学为人、为人类社会的服务中，其所具有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肯定可以在现实中为树立“人的法则”，批判“一切为利益让步”的“物的法则”做出有益的贡献。

传统与现实及其未来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并不是绝对的，关键是要对历史传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还要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在过去与当代、未来的人和人类社会的需要之间搭起一座联系的桥梁。考古学的学科性质要求其应该主动地、有意识地做到这一点，所以考古学就不能把自己尘封于“象牙塔”内。

2、考古学有大众化的一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考古学的萌生可以追溯的很远，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地质学、生物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直接渗透到欧洲的“古物学”中，才发展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虽然有一种观点认为11世纪北宋中叶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实际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近代科学思想以及西方考古学的影响并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才在中国产生的。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形成虽然较晚，但是作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他有一套比较完整、严密的方法论，而且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许多学科有着不可分割

的密切联系。

考古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的特点,它研究的对象可以反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信息。也就是说,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各种物质,但是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因为各种遗物、遗迹和痕迹所能够反映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考古研究的各种遗存是物质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的种类、数量和制作方法自然反映生产规模、工艺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物质文化;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活动是具有社会性的,那么考古学研究的人类活动中留下的遗存自然是社会性的产物,由实物所反映的工具质地的变化、工艺的不断演进、墓葬大小及其规模的变化、聚落和城址的大小变化等方面必然也会反映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古代的各种遗存又是在当时人们各种观念和思想指导下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装饰品、花纹纹样、祭祀遗迹、墓葬所反映的葬俗、聚落和城址的变迁等方面也能够折射出当时的审美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格局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因此,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非常广的学科。因为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得到这些相关学科专业人员的支持和协助才能把研究深化和细化。单靠考古专业的人员,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学科人员的支持,所以很多相关学科人员对考古学的了解和介入是考古学发展的必需。

另外,也正因为考古学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的特点,所以其他许多学科也非常需要考古学的支持,考古遗存可以提供的信息面很广,而这些信息正好可以被其他许多学科

在研究中所利用。比如在农业史、生物史、冶金史、科技史以及古环境等学科的研究中,可以说如果离开了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和支持,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将大打折扣,甚至有的学科将无法展开工作。正如经典作家所言,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问题,最可靠、最必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其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其现在及其将来是怎样的。认识过去对于理解现在、将来乃至理解人类的一般处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要深刻理解任何事情,都必须对它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因为考古学的涉及面很广,可以给许多学科提供研究很多问题历史上的实物资料,以利于对这些问题现时的把握和将来发展的预见,这就要求考古学要具有开放性而不可能闭门造车。

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它与其他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互进的辩证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互相促进,所以考古学要想持续发展就不能封闭自己,而必须面向大众。同时,由于考古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信息量很大的特点,也决定了考古学应该也能够为人类现今及其将来整体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做出贡献。

3、考古学有大众化的一面是社会的需
求

考古学确立及发展的背景之一就是社会的需求,其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后,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人们极力寻找一个新的世界,引发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文字和美术作品研究

的浓厚兴趣,从而使许多人热衷于对希腊、罗马时代铭刻及美术作品的收集和研究,进而扩展到对其他地区的古物古迹的寻访、搜集和研究,最终促成了考古学的建立。随着在西欧和北欧的许多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相继成立,它们试图用祖先遗留下来的古迹和古物来宣扬自己的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和民族的自豪感;而二战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为了发扬本国的学术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都逐步重视和开展了考古工作,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这又突飞猛进地推进了考古学的世界化程度。可以看出,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以社会的强烈需求为背景的。

另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生活中对文化、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在不断攀高,人们渴望并自觉地不断完善和健全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以利于自身现在和未来的综合发展;追寻知识、探索未知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内容必需的一部分。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三个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千古之谜,而考古学无穷的诱人魅力正在于可以对某些未知领域超越时空的不断探索。人类对自己的“幼年”和“童年”有着天生的文化寻根的好奇心,过去由于人们获取信息的不平衡,大多数人了解历史的途径相对较少,而到了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心理需求就越来越强烈。追溯人类久远的过去、弄清人类的来龙去脉、了解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是人的天性,考古学则可以穿越历史的尘封,唤起历史的记忆,极大地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

通过考古学来深入了解人类过去的众多

方面,可以为大众的精神成熟、人格完善、提高人文素养提供有力的帮助。所以,近些年来数量不少的考古科普著作的热销,以及与考古、博物馆有关的电视节目有着较高而稳定的收视率,都说明了人们渴望了解考古学、渴望了解人类过去的热情在节节攀升。社会的需求要求考古学要有好的发展和普及,要为大众服务,要面向大众,考古学也应该为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考古学要想有好的发展,就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考古学有大众化的一面,而且要主动地服务于大众和社会。实际不仅仅是考古学,任何一门学科不把服务于当代和将来的人和人类社会作为自觉的追求和方向,它肯定是不会有好的前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时常会听到人们说某种学问的现状是“举步维艰”,甚至已经成为“绝学”,已“后继无人”、“难以为继”的说法,这在考虑这种学问已经边缘化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之外,应该也与这门学问是否有意识地主动把服务于当代和将来的人和人类社会作为自觉的行为和方向是有密切关系的。对于考古学来说,正如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所言“古今一体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性能”,实际上谁也无法完全割裂现时、未来与过去历史的联系。应该说考古学的现实意义是永存的,关键在于怎样去发掘它的意义,怎样寻找到一个与当代以及未来社会的一个连接点,来发挥它的一些启示今人以及预测未来的作用。

二、大众要了解考古学的哪些内容

考古学既然具有大众化的一面,那就涉及到大众对考古学的了解以及考古学对大众

的传播方式、途径。

先说大众对考古学的了解。非考古专业的人员因其所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不同、生活背景的不一以及兴趣的差异,其要了解考古学的方面也不同,会有差别,但是,从考古学与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的角度来看,总体来说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考古学的具体成果和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

1、考古学的具体成果

考古学的具体成果,即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众多新发现和经考古学研究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知识点。虽然由于时间、空间、技术手段以及方法、理论等具体情况的局限,考古学研究的具体成果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而是在不断地修正中,但是人们对这些成果的了解可以拓宽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增进对历史的深刻准确把握、改进思维方式。

试举几例:

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以该馆所藏的史前古物的研究出发,结合古物的质地、墓葬的共生关系、器物的制造方法以及风格形式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排比,用实物来实践和证明了已经有的石、铜、铁的三期论的看法,并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的分类体系。他认为史前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人类技术进步的时期,成功地将丹麦的史前史梳理出了一个大概的年代学序列。其后的众多考古学者又把“三期论”广泛运用于野外发掘遗物的分期,并以野外发掘中所见的地层关系及其器物的逻辑演变作为证明,使“三期论”成为具有比较普遍意义的人类早期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而“三期”论也成为大众比较准确、深刻地认识人类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常识。

19世纪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推翻了

《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尤其是19世纪中叶,随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人们认识到人类至少在数十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此后进化论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而1856年在德国发现的欧洲早期智人阶段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则被引用为进化论的物证,否定了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臆说;现代在东非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则又把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追溯到距今300万年前,这就从考古学上彻底颠覆了“神”的世界,使人们进入了“人”的世界。对于这些考古学成果的了解,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由于认识能力上的不足和现有客观条件的局限,人类未知的领域确实很多,但把人类智慧目前不能完全解释的世界交给“神”则是完全荒诞无稽的。考古学的每一次发现、探索和研究,都为使人们由认识上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31年,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梁思永先生发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他改变了当时许多人按照深度计分地层的方法,而是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以实际堆积的地层关系为依据,首次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破天荒地揭示出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三叠层,为判明这三支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序列奠定了基础。这个成果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并使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轮廓得到了初步的究明。这也为人们对中国扑朔迷离的早期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打下了基础,这个成果至今仍然是人们认识和探讨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基础,也是解决中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中华民族起源的出发点之一。

考古学文化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集中于特定地域、具有地方性特征的遗物和遗迹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属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对不同考古学文化及类型的发生、演变以及对处于不同地区和时间上的考古学文化及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有助于人们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各个国族及民族形成及其相互交往的历史状况。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有其地域和时间上的局限性,一种文化绝对不可能代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期,众多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地域同时存在,而每一种考古学文化则大体代表着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体,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今虽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逐步“全球一体化”,但是在当代以及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之间文化传统的不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个世界仍然是多极化的文化格局;而多极化的文化格局则导致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多极化的政治格局是个客观存在,它的基础就是多极化的文化格局。只要有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就存在着政治方面的差异和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在政治上实行单边主义政策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政治上的单边政策,其思想基础就是企图忽视其他文化而想用一种文化涵盖其他所有的文化,这是难以做到的。所以虽然逐步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已经很大,但是当代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多极化是有其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在考虑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战略时任何人也不能无视这一点。而对众多并行发展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内涵的了解,则能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世界是多极的,为什么要强调世界的多极化,为什

么要强调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和包容。

2、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

考古学方法是指在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初步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包括收集、保存、审定、编排、考证资料的方法和技术;考古学理论即用于解释、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提炼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各种理论。非考古专业的人员,大都对考古学的了解局限于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非考古专业的人员(特别是从事与考古学联系比较密切的学科工作的人员),希望了解考古学的各种方法和理论,因为没有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方面的知识,就难以对考古学进行全面完整的了解,对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成果也会理解不深刻;另外,虽然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还在不断地完善中,但它毕竟是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任何人对考古学方法和理论的了解,都可以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增强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举几例:

考古学研究的实物资料多埋藏在地下,需要经过科学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才能被系统、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在发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运用考古地层学的理论。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引进来的,由于人类在同一遗址的长期活动和延续,人类生活而形成的文化层堆积会越堆越厚,层次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经过人为和自然的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相对要比下层的年代晚,越下层位的遗存的年代就相对越早,而文化层的堆积就构成了这一遗址的“编年历史”。田野考古发掘就是要以地层学为依据,逐层翻开这部尘封久远的历史“地书”。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必须恪守地层学的原则,使用各

种技术和手段，主要是依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和包含物的变化，从错综复杂的地层关系中逐层将历史的原貌井然有序地揭露出来。了解这些，对人们历史及科学精神的培养，以及细致、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的，主要研究遗存外部的形态和演变过程。由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加以系统化的考古类型学理论，将众多错综复杂的遗物或遗迹经过相互比较以后，按型（即把握众多不同类型遗存的横向或纵向分类）、式（即把握某一类型遗存的纵向演变）进行排比，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然后按照型、式间的变化排出一个符合形式逻辑的序列。经过考古地层学验证的类型学序列则大体代表了这类遗物或遗迹在时间上的演变趋势或发展过程，同时也为以后确定所遇到的相同或相似的遗物、遗迹在历史过程中的位置提供了依据。这实际就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研究法，它不是以僵死的、静止的眼光看问题，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看问题。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不仅可以把每一型或式的遗存恰如其分地归入它在历史上应该所在的位置，即准确定位，也为考察某一类遗存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其现在是怎样的，以及以后可能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了解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会为人们思考和解决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培养人们处理头绪众多的问题的敏锐的眼光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有效地了解、概括和有机地整和大量分散无序的材料。

从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学家菲奥雷利改进庞培古城的发掘方法，他以恢复古城的原貌为目的，对遗址中的房屋遗存按“单

元”进行发掘。他讲求层位关系，并把遗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揭露，研究“单元”与“单元”之间的时空和功用关系，而且无论是贫民的居住场所还是富人的邸宅、无论是精美的艺术品还是一般的生活用具都同样受到重视和研究。菲奥雷利改变了其以前艺术品收藏者或者一些考古学者对待古物的态度，他不仅仅是为了挖出个别的“古董”和“宝贝”，而是把考古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出土遗存注重地层和时空环境。这对我们认识和研究任何问题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提示我们不仅要全面、多视角、宏观地把握和占有材料，又要很好地注意细节，既要注重个别也要注重整体，同时要了解时间和空间的真实具体情况才能够有效地把握和解决问题。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相当准确地把中国境内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包含部分青铜文化）划分为六个大区和概括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大片。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即“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各大区系间也还会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而且区系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这个理论冲破了长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想，使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转化为一个历史的框架，从而为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联接建立起了一个桥梁，使考古学材料可以按照其历史的本来位置来研究其所反映的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状况。通过对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的了解，可以启示人们任何事物都不能看作是铁

板一块，在研究和讨论问题中不能囿于成见、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要以实际情况出发，从客观现象中科学地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才能使所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条理清晰、贴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提醒人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要以历史对比的、差异的、层次的、发展的和相互联系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

总之，大众对考古学的了解，因其每一个个体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导致每一个个体要了解考古学的方面也不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或者只了解考古学的具体成果，或者考古学的具体成果和理论兼而了解；而考古专业的人员主动所做的对大众的考古学知识普及化的工作，也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传播不同的考古学知识。无论大众从哪一种角度来了解考古学，都可以对人起到完善知识结构、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增强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的作用。

三、考古学知识大众化的方式和途径

考古学知识大众化的方式和途径，实际就是考古学怎样对大众进行传播。常常听到非考古专业的人士说看不太懂非常专业的考古论文，而看考古发掘报告更似在读“天书”、如坠五里云中，更极端的还有认为考古学脱离大众和社会，说“考古学没有什么用”。当然，这里面虽然有“术业有专工”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考古专业人员所做“科普”（即大众化、通俗化）工作的欠缺。那么，要想真正体现出考古学大众化的一面，要使考古学面向大众而服务于人和人类社会，做好考古学的“科普”无疑

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做好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主要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呢？我认为除了现在经常采用的出版——即多出一些与考古学知识普及有关的图文并茂的书籍外，其他好的方式还有借助于电影与媒体以及团体组织的力量。

1、电影与媒体

就中国来说，借助于电影与媒体宣传考古学知识，至迟在“文革期间”就已经偶尔为之了，比如通过记录片和报刊杂志对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及研究成果的介绍就很有影响。近年来，考古学“科普”工作不足的情况有比较大的改变，这首先体现于各种媒体对考古发现及研究工作报道的日益重视，不仅在电视上进行了几次对考古发掘现场的直播，还做了不少有关考古的电视专题节目；报刊杂志对许多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报道也很及时，并且时常可以看到有关考古的专题版面；网络对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报道更是快捷，一些专门介绍考古学知识和成果的网站也初具规模。不少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包括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也开始注重向社会介绍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成果，他们不仅在各种媒体上撰写了数量不少的考古学科普文章，还出版了一些质量比较高的普及性考古著作，并且引起了热卖。可以这样说，目前在全国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个认识考古、了解考古的热潮，这些都对普及考古学的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和关注。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过去的人们在生活中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痕和遗物，这些遗存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可视性。虽然许多专业人员对电视现场直播考古发掘有批评，认为考古工作的性质与电视的现场直播还不好融合，但这只是一个如何衔接的可以探讨

的技术问题。所以，对考古遗存的介绍，在人们不能够或者少到考古发掘现场，不能或者很少接触古代实物的情况下，通过电影与各种媒体的设备和手段，用大众喜闻乐见、生动通俗的形式来全方位地介绍、展示考古遗存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效的方法，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使人们更好地接受、掌握考古学的科学知识。

通过电影与媒体宣传考古学的知识和成果，除了电影和各种媒体部门要比较深入地介入和重视考古工作外，考古专业人员也要有强烈的作好普及考古学知识的意识和责任感。考古人员除了做好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撰写专业的考古论文和报告外，还应该多写一些高质量的通俗易懂的考古科普文章，并主动多与各种正规的媒体部门联系、密切合作，力争把考古的最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种形式，科学、准确、真实、及时地公布、展示和介绍给大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考古的方方面面的作用、满足大众对考古学的各种需求，这也是考古人员回报社会的一种好的方式。

2、团体组织

只靠个人或者少部分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要大力开展考古学大众化的工作，依靠集体的力量、建立旨在传播、普及考古学知识的团体组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为考古工作者向大众传播考古学的各种基础知识提供一个平台，也能够使大众通过这个组织的各种活动准确、迅速地了解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1979年正式成立的“中国考古学会，”只是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专业性学术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人员均是单纯的文物考古的专业人员。显而易见，

这样的专业组织并不能很好地进行考古学普及化的具体工作，而应该在专业组织之外，另外建立面向大众的团体组织。“香港考古学”会比较成功的经验应该可以借鉴。“香港考古学会”不是一个专业学术团体，任何对文物考古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它的会员不仅可以常常组织起来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博物馆等场所与文物近距离或者零距离接触，组织各种有关文物考古的讲座和报告，还可以参加由考古专业人员指导下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香港考古学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无疑是有益于文物考古知识的普及的。

另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有组织的各种专业考古学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也不必一定非得是考古专业的人员才可以参加，允许非考古专业人员（特别是从事与考古学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学科人员）的参加，不仅表明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也对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会有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近年来不仅在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中考古专业人员非常注意邀请相关学科人员的加入，而且在专业的考古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中，也有不少非考古专业的人士参加。总之，考古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意识，重视在各种场合和情况下与公众的交流，在与大众的互动中承担和完成考古的科普工作。

自清代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就有不少先贤不断地强调“经世致用”的理念。“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社会，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务当世之务、勇于创新、勇于任事以改造社会。虽然“经世致用学者”们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除具有那个时代的意义之外，今天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和观念，对于我们今天搞

学术研究无疑还是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考古学的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当今对“经世致用”传统学说发展的一种尝试。因为,今天的文化与古代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现代及将来的发展必定是以过去的历史作为基础的。强调考古学的大众化,最终是为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培养人们开阔的心胸、宏观的视野、追求知识的强烈好奇心、创造和想象力、完备的国际观以及比较高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同时良好的社会氛围中也可以对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经济迅猛增长、官员的所谓“政绩”和开发商的利益成为“硬道理”的现实社会,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绝不能降伏于现实的实用功利主义而急功近利,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对于考古学“有用”还是“无用”的疑问,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民族振兴、国家崛起,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此为“高山仰止”的目标,“虽不能至,亦当望之”。在现今中国,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才仅仅是开始,还任重而道远!

主要参考文献: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

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曹兵武:《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学苑出版社,2004年。

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岭南地区出土的几种青铜乐器述评

李龙章

岭南地区出土的先秦及秦汉时期青铜乐器，部分属零星发现，也有部分出自战国秦汉墓葬。根据笔者收集的不完全资料，岭南出土的这一时期青铜乐器以甬钟为最多，其他乐器有钮钟、鎛、铙、钲、铎、句鑃、铃、鼓、鐃于以及锣(?)等。本文拟对甬钟、钮钟、鎛、铙、钲等几种钟形乐器作一综述，并就相关问题谈谈个人浅见。

一、甬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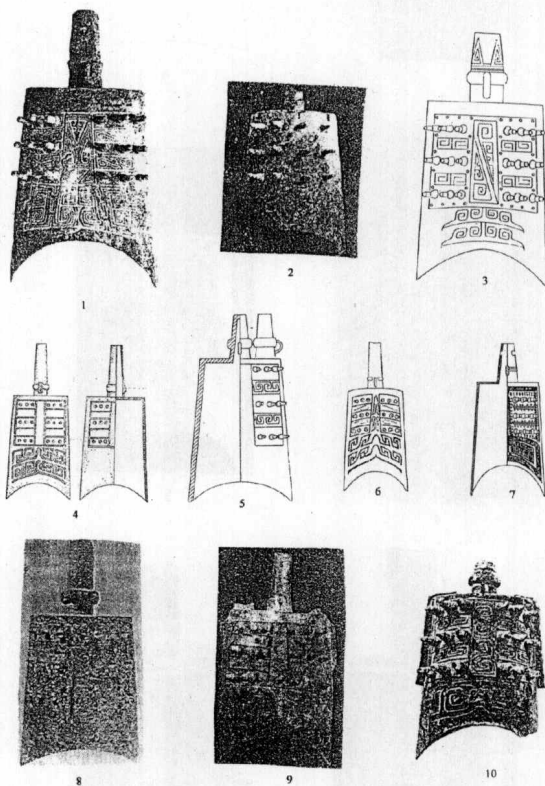
1、型式

岭南所见甬钟大致可分为五型。

A型38件。有旋有干曲于。可分为四式。

I式7件。阔腔阔鼓深于有景式。属此式的有清远马头岗M1所出4件(007: 1、2、008: 2、009: 1)⁽¹⁾、恭城秧家2件⁽²⁾、广东连山1件(年代被定在西周中期)⁽³⁾。此式钟每面一般饰有十八个枚，但马头岗007: 2钟正面只有12个枚。马头岗钟除009正面有阴铸花纹，其余均为素面；秧家钟正面篆间饰阴线斜角云纹，钲间饰阴线蝉纹，鼓部饰对称阴线勾连云纹，背面却无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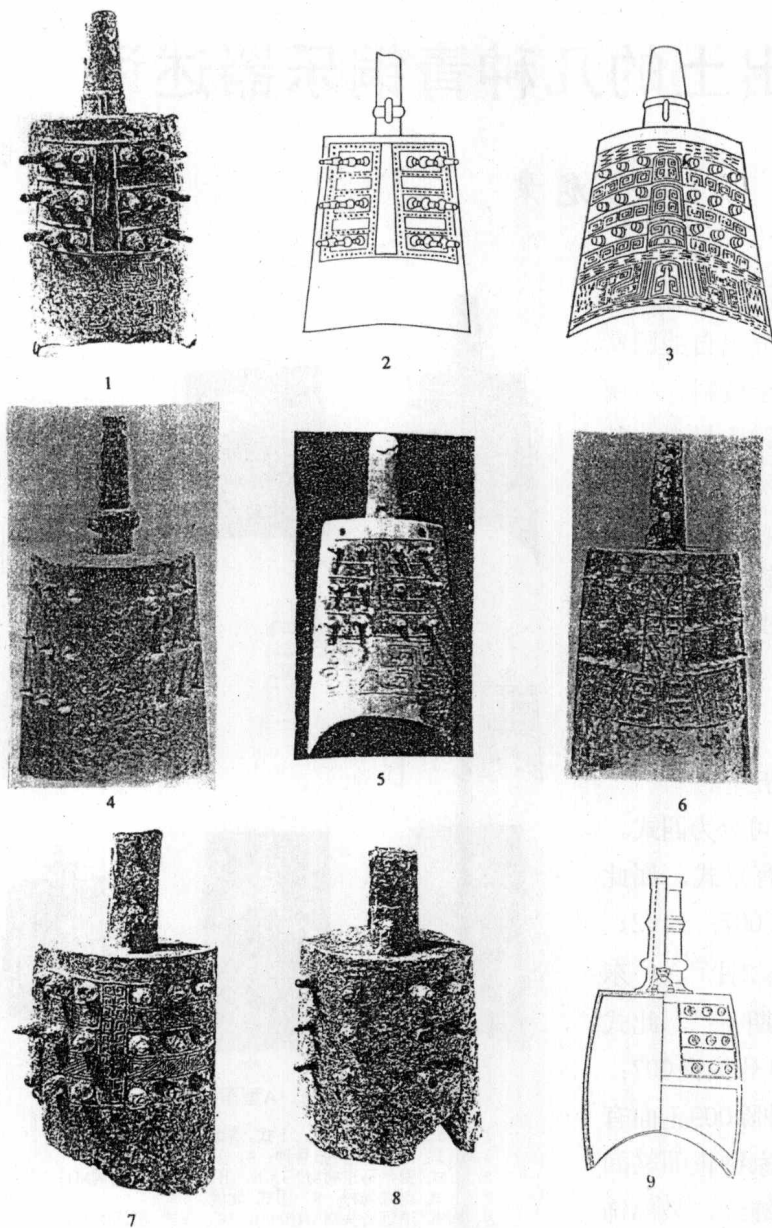
II式28件。长腔直铣阔鼓深于有景式。属此式的有罗定南门垌一套6件⁽⁴⁾、肇庆松山一套6件⁽⁵⁾、广东博罗陂头散屋村出土一套7件中的6件(时代被定在春秋)⁽⁶⁾、广东兴宁新墟镇鬼树窝窖藏出土的6件⁽⁷⁾、广东连山1件(西周中期)⁽⁸⁾、广州增城汤村1件(战国)⁽⁹⁾、贺州马东村1件⁽¹⁰⁾。广西田东大坡岭出土的1件钟似也属此式⁽¹¹⁾。南门



图一、A型甬钟

- 1、I式 恭城秧家；2、I式 清远马头岗M1(007:2)；
3、II式 博罗散屋村3号钟；4、II式 肇庆松山；
5、II式 贺州马东村M2:3；6、II式 罗定南门垌M1；
7、II式 增城汤村；8、III式 北流；
9、IV式 清远马头岗M1(008)；10、IV式 柳江木罗村。

垌、散屋村钟均为拼凑组合，南门垌1、2、4号钟各有36个枚，而3、5、6号钟各只有24个枚。松山钟、南门垌钟、散屋村钟正面多数饰有上下对称勾连云纹。但散屋村钟花纹明显分为几组，1——4号鼓部为上下对称勾连云纹，5号鼓部为单层变形窃曲纹，6号为左右对称卷云纹；1、2号钲间饰蝉纹，3——5号钲间饰斜角雷纹，6号钲间素面；1号篆间饰勾连云纹，2号篆间饰斜角卷云



图二、其他各型甬钟

- 1、B型Ⅰ式 宾阳韦坡；2、B型Ⅱ式 博罗散屋村7号钟；3、B型Ⅱ式 惠来华湖；
4、B型Ⅲ式 宾阳；5、C型Ⅰ式 清远马头岗M2(005:1)；6、C型Ⅱ式 横县南乡；
7、C型Ⅲ式 宾阳韦坡M1；8、C型Ⅲ式 宾阳韦坡M2:2；9、E型 南越王墓。

纹，3——6号篆间饰勾连云雷纹。马东村钟鼓部无纹，篆间饰有勾连云纹。鬼树窝各钟正面有花纹，背面无纹。但各钟花纹不尽相同，1——5号钟钲部饰有菱形纹，6号钟钲部则饰三角纹；1——5号钟篆间素面无纹，6号钟篆间饰斜线纹；各钟鼓部均饰有上下对称的勾连云雷纹，但以6号钟花纹较清

晰。增城汤村钟甬上有圆穿，干（报道称为旋——笔者注）作绳索状，正面钲部有尖利似刺的乳针，上下为双行，左右为单行，靠栞部两侧饰有曲折纹，鼓部除有勾连云雷纹外，正中还饰有双“王”花纹。背面花纹与正面差不多，但钲部周围的乳钉均呈单行排列，鼓部花纹周边围绕曲折纹，正鼓部无双“王”纹。

Ⅲ式1件。阔腔直钲窄鼓无景式。广西北流出土的1件时代被定在西周中期的甬钟属此式⁽¹²⁾。此钟锈蚀严重，正面纹饰不见，舞部尚见少许兽面纹。

Ⅳ式2件。深于有景起脊式。清远马头岗M1所出的008：1钟和广西柳江木罗钟属此式⁽¹³⁾。除两钟在舞面和两栞都起扉棱外，马头岗钟基本为素面，而木罗钟的钲间、篆间和鼓部均饰云雷纹。

B型6件。有旋有干浅于或平于。可分为三式。

Ⅰ式1件。长腔直钲阔鼓浅于有景式。宾阳韦坡

M2：1钟属此式⁽¹⁴⁾。此器正面鼓部饰有窃曲纹，其余部位均素面无纹。

Ⅱ式4件。阔腔平于或浅于有景式。时代被定在春秋的博罗陂头散屋村7号钟、广西横县妹儿山钟（被定在西周）⁽¹⁵⁾、广西忻城大塘钟（被定在西周中期）⁽¹⁶⁾、广东惠来